

◆ 张 彤

与蜡梅同住

前不久与家人一起到外地玩，网上订的一家连锁酒店，在一楼还有一个小院。我一到房间就被这个小院子惊艳了，因为院子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蜡梅，另一棵也是蜡梅，时值初春，花开得正盛，它们在阳光里的花瓣近乎透明，而花蕊里那一点朱红就更加惹眼了。我拍了几张图发到微信里，说腊梅正开。诗人小西马上纠正我，应该写作蜡梅，因为它的花像蜜蜡一样。蜡梅并不是梅，梅花是蔷薇科植物，蜡梅则属蜡梅科。经过这么一番科普，我对这两株蜡梅的兴致更加浓了。我们信号山路25号的院子里也有一株蜡梅，往年开得很盛，今年大约是天气冷还是什么原因，春节前还只几个小花苞。不想蜡梅之盛，在这里补上了。

接下来几天的时间，尽管行程紧张，但一回到酒店，我都会到小院子里坐一会儿，那几天温度适宜，我们有时就点了外卖坐在院子里吃饭，一边吃，一边看到蜡梅花上的阳光一点点变红，又一点点地暗下去。酒店一楼的房间都有一个院子，但唯独我们这一间是有蜡梅花的，仅凭此一点，就觉得不虚此行。

女儿说，如果把把这些照片发到“小红书”里，这间“与蜡梅同住”的客房一定会成为网红。我对所谓的“网红”一向反感，因为无论什么成为了网红，就迅速变得乏味，这间房如果真的成了网红，“小红书”上一定会精确地指导人们，最佳赏梅时间，最好拍摄角度，本来一件风雅的事，被拆解成广播体操岂不是很傻？不过我又想，即便房间不红，我们再在同样的时节到同一间酒店，订上同样房间的可能也几乎是零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也难两次走进同一个房间，这是个概率问题，也是个哲学问题。

回想起来，我反复住过的酒店好像只有北京的齐鲁饭店和上海的明珠酒店。齐鲁饭店在什刹海，环境很好，只是我频繁去住时，那里还不通地铁，最近一次去北京，发现地铁的北海北站与酒店只有数百米。齐鲁饭店旁边有一个小吃店，卖炒饼，分量很大，炒饼中有肉有菜还有饼，既是饭，也是菜，再加上两瓶燕京啤酒，经常是我一个人的晚餐。吃饱喝足，回酒店写稿，那个饼很瓷实，一大盘饼

估计没有半斤，也得四两，如果换成现在，大晚上吃一盘非得积食不可，不过那时正是“吃一盘钉子也能消化”的年龄，区区一份炒饼当然没什么大不了。上海的明珠酒店则是上海电影节的指定酒店，每年去采访电影节都住这里，酒店位于肇家浜路，距离襄阳路的服装市场不远，那几年，我穿的衣服都是在这个市场买的。服装市场里的衣服全是假货，洗上几次就变了形，也是仗着年轻，啥都敢往身上招呼。

“与蜡梅同住”的房间勾起了我许多回忆。从前做记者，时常出差，但与蜡梅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，那时出差都是两人一个标间。有时一个人出差，住到标间里，看到洗手间里有打开的牙刷，衣橱里挂着陌生的衣服，就开始猜测同住的人有啥特征，抽不抽烟，健不健谈，睡觉打呼吗？

有一年春节前，我去北京采访春晚彩排，那时，全国晚报有一个文化记者学会，每年会与春晚剧组协调，留出几张票，供全国各地记者观摩。大家到了北京，先去《北京晚报》文化部报到领票，我去时恰好遇到几位全国各地的同行，我们便找到一家报社的协议酒店，全都住在那里。同屋是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老哥，他一到房间就摊开稿纸，冥思苦想，我说：“还没采访呢，您要写啥稿子呢？”他也不答。到了晚上，他把那几页纸拿给我：“小张，你帮我检查一下，有没有错字。”我一看，原来他是给他们的总编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要求分房子。当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，符合条件的人都在争相抢末班车。从这封信的内容看，这位老兄虽然已经三十几岁，但还没有结婚，并且群众基础不太好，打分不高。信中陈述了他对于报纸发展的贡献，之所以群众打分不高，在他看来是因为“木秀于林，风必吹之”。我说：“大哥，难道不是‘摧之’么？”他瞪着两个大眼看着我说：“你比我们领导水平高，我都这么写了好几年了。在他们的言里，‘吹’与‘摧’是同音，他打小就这么写。”这位老哥的名字我一直记着，后来互联网兴起后，也时不时在新闻网站上看到他的稿子，每次看到我都禁不住想：不知他分到房子了吗？群众之风是不是吹（摧）到他呢？

出差在外，与谁住一个房间都是随机的。一次在宁波采访金鸡百花电影节，与我分在一个房间的是南方一家广播电视台的记者。我每天采访完，先与朋友们到附近的排档吃喝一顿，然后回酒店写稿子，每天写完都得半夜一两点。写稿时免不了要抽烟、喝水、来回溜达，估计同屋的哥们也睡不踏实。搞得我心里很愧疚。不过，我很快就不愧疚了，因为这哥们接到后方的电话，要他每天在早间节目中播报电影节的新闻，于是，他每天四五点就起床，跑到卫生间里声情并茂地念稿子。南方人普通话不灵，有时念着念着嘴就“瓢”了，我躺在床上恨不得把他从卫生间里擒拿出来，替他念一遍。

住酒店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工作经验的一部分，酒店里有许多设施与家里不同。比如，一次性牙膏的盖子里藏有一个尖尖的头，可以刺穿牙膏的封口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味地用力捏，牙膏就容易走了“后门”。在浴缸上面的墙壁上有一个像铃铛一样的东西，可以拉出一根绳索，用来晾衣服。好莱坞有一部系列电影叫作《死神来了》，故事就是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奇地死去，其中一集有一个人便是被这个晾衣服的绳索勒住了脖子。看过这部电影后，我每到酒店都对它十分敬畏。酒店里的袋泡茶在当初也不常见，第一次喝的时候，我把外面的纸包撕开了，好嘛，这一杯茶比北京人常喝的“茉莉高碎”还要碎上一百倍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酒店退房不再设有查房这个环节，想必是酒店里的毛巾、水杯极少丢失，早些年，这个查房的过程是很繁琐的。集体出行时，大巴车已经停在酒店门口，除了领队，所有的人都已落座，而前台还在不紧不慢地核对一个个房间的情况。偶尔遇到某些队友，喝了冰箱里的收费酒水，自然少不了一通周折，假使计生用品的数量对不上，还会为余下的行程增添话题。退房时查房，是因为酒店里的东西常丢，常丢的原因是酒店里的用品比家里的高级。现在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即便住五星酒店，许多人也是自备毛巾、拖鞋，讲究的人连床单枕头都要自带。

2012年，我参加广播电台主办的欧洲万

里行活动。这个活动要开车去好几个国家，经常一天换一家酒店。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酒店卫生间里，我们发现马桶边通常还有一个与马桶差不多大而没有盖子的洁具。同去的朋友颇为疑惑，我则想起多年前曾看过一位日本作者尾妹河童写的书，叫作《窥视欧洲》。尾妹河童是一位舞台设计师，他游历欧洲，将所见所闻都写成了图文并茂的文章。其中亦提到这种名为“净身盆”的设施。作者说，因为欧洲人不像日本人有泡澡的习惯，所以常用此设施来清洗下身。根据尾妹河童的考证，在欧洲越往北这种设施就越少，而在拉丁语系的国家，无论酒店多么小，都会设有“净身盆”。这不是马桶，不能便溺，尾妹河童甚至用它来冰镇水果，因为“吃的时候还是要削皮的”。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同住的哥们，他认真地说，“净身”这个词是不是不好？

欧洲的酒店很少见所谓的“标间”，往往都是大床房。于是，我与同住的哥们，每天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拆床。我们发现，大部分的大床居然都是两张床拼的，偶有单床，便把床垫抬下来，一人睡床板，一人睡床垫。同屋的哥们不久便找到了窍门，每到酒店便写一张字条“two beds”，然后在字条上面放一点小费，这样等我们再回房间，床单都铺好了。

去年，我去一座小城参加文学活动。旅游旺季，房间紧张，所以，主办方都是安排两人一间。我来到房间时发现，同屋是一位熟悉的作家，他正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箱子发呆。他一看我来了才松了一口气说：“我正在这儿想，也不知跟谁同住，要是不认识有多尴尬。”他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开箱子说：“我这箱子还没拆呢，我想要不晚上回家得了。”

其实，我也差不多，人越年长就越怕见生人。年轻时跟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同室数日，不仅不尴尬，还成了朋友。而人到中年之时，竟然只能与蜡梅花住一个房间了，哈哈，难道我们会成为林逋那样的高士吗？我与这位作家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，他说：“能成高士当然好了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机会啊。”说着，我们就都沉默了。



◆ 李晓燕

保卫阳台

六点多，我坐在阳台的坐垫上看书，享受独处的安宁。

阳台上高高矮矮的花儿在自己的空间里肆意伸展，醒着，或是在一场梦中。窗外的鸟雀却是已经开讲，叽叽喳喳的麻雀絮叨地说起昨天的经历，喳喳喳，喜鹊听了随声附和。

视线无意中扫到旁边几只正在运动的蚂蚁，它们跑跑停停，悠闲地出入我的坐垫。目测绝不止两三只，我像往常一样伸手去消灭，它们奔跑的速度甚至快于我，瞬间消失在坐垫下面。掀开坐垫赫然发现还有不少在此集会，它们感知到了危险，正试图改变方向逃跑。

我很早就知道阳台上有蚂蚁，常常看见它们在空空的阳台上四处奔跑，忙忙碌碌两手空空，不知道是为啥？甚至感觉它们为生机勃勃的阳台增添了活力。

顺着几只蚂蚁奔跑的方向看，我发现了更多的蚂蚁围聚在那盆君子兰花盆四周，它们四处逃窜，分散我的掌控力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掌去围剿，一群结束又来一群，竟如川流不息的流水，已经不是我用手轻易就能消灭的了。

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我开始寻找蚂蚁的巢穴。在君子兰花盆下面的水盆里有几团拱起的小土丘引起我的注意，想来蚁穴应该就在花盆里了。抬头才发现近在咫尺的花盆里，密密麻麻地流动着蚂蚁团队的身影，视线所到之处每寸花土都在翻动，刺激着我的神经。很明显这里已经被蚁族占领，形成了完整的蚁群部落。不敢想象这样下去，阳台上其他的花盆会不会也被攻陷。

难怪这些日子几乎每次坐在阳台上都会遇见一群蚂蚁，它们在数量上明显呈上涨趋势，遭到围歼的蚂蚁，还试图搬回同族的尸体，这不仅让我暗自赞赏它们的团结和义气。在数次歼灭后，面对越来越多的蚂蚁，我曾花盆四周喷洒过灭蚊药，以为这样就能解决了。没过几天，又看见它们浩浩荡荡地从厨房运送粮食，显然花盆里已经具备一个完整的巢穴功能。君子兰的花土排水、通风性好，这是我屡次浇水它们还能安然存活的原因。

看来要想彻底解决后患，必须要马上更换花土。我放下书，迅速搬起君子兰往楼下走，感觉搬的不仅仅是一棵花还有数不清的蚂蚁，不由生出密集恐惧感，庆幸楼下小屋还有花土可以更换。

我把花盆放地下，准备拔起来看看根系。尝试过几下，土太硬怕伤到花根。还是先用水浇浇。果然这个方法好用，很轻松就把整棵花请了出来。君子兰白白的花根裸露出来，有的根系已经枯烂，我顺便梳理下来。同时出来的还有数不清的蚂蚁，它们出逃的方式看起来并没有组织纪律性，不少工蚁扛着白色虫卵，慢慢腾腾地翻山越岭。

整棵君子兰的花土，花盆，花根上都是蚂蚁，连续用了几盆水冲洗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有的蚂蚁钻进花叶根缝隙里躲着不肯出来。我只好把整个花根放进水桶里浸泡，让水将它们清出来，然后迅速重新换个大点的花盆。先垫一层新土，然后把花放进来，再往里填土。换上新花盆的君子兰明显精神了很多，给它浇完水搬回阳台，留着楼下一地花土残根继续和蚁族纠缠。

我晚上回到阳台上看君子兰，它在新花盆里用力昂着头，伸长脖子往上，我都它往上拉拉身体重新适应新家，它乖巧地听从安排。

这是母亲送给我的君子兰。这些年，它一直在阳台的一侧，不动声色地张罗着花事，花朵却时常卡在脖子里，花杆伸不出来。母亲的这盆花是她朋友送的，曾告诉我朋友家的君子兰开得多好看，还给它喂有营养的食材。我于是效仿着将一点过期的食材和奶喂给它，后来又喂了花肥，它才羞羞答答地伸出花杆，虽然不高却比以前好多了。或许正是这样的花土才招了蚁群到盆里安营扎寨。

今年，这棵老君子兰竟没开花，有几片叶子的边缘也开始萎黄，如同秋天的树叶。我知道叶片发黄是根系腐烂的缘故。那么，它是否在用新黄的叶片提示我，不舒服的位置在根部，那里已经被蚁族占领，而我这个主人近在咫尺竟浑然不知呢？

◆ 王旭虹

心随风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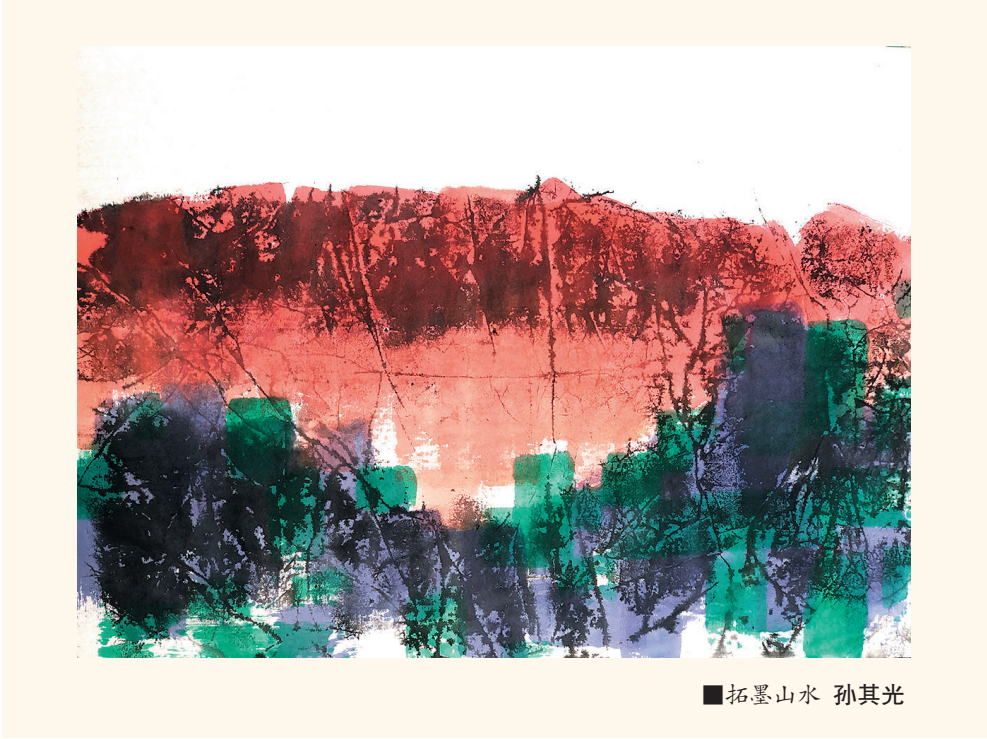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已至，远山逐渐显露出黛色，天气虽然还有些许寒意，但春天的气息已经浓厚。人们不再紧裹衣衫，而是敞开胸怀，迎接春风的拂面。植物和动物保持着生命的本真，因此它们最先感知到季节的变迁，用生长和开花的方式，最天真热烈地表达对春天的热爱和回应。

虽然已是三月了，但年味尚存。年货的底子吃得差不多了，人们开始走出家门。家门口三里有个大集，上百个摊位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。有卖水果的、卖蔬菜的、卖肉食的、卖海鲜的、卖衣物的，还有卖鲜花的……人群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

我一直觉得人们选择卖什么，肯定是了解什么，喜欢什么。譬如，卖衣服的女人，一定喜欢穿衣打扮，相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对衣服有兴趣，有研究，所以才选择卖

衣服，而不是卖水果或者蔬菜。卖书的人，一定有一个喜欢读书的灵魂。卖花的人，一定热爱生活，喜欢养花。所以才能做到朝朝暮暮，一年四季把各色各样娇嫩的花、连着沉重的花盆，装车、卸车，摆在大集上露天叫卖。你看看那个卖猪肉的身材肥硕的媳妇，扎一条洁白的围裙，戴着卫生帽，守着一大锅热腾腾的肉，边叫喊边从锅里夹一块，丢进嘴里，嘴巴上额头上都油亮发光。这个女人一定是有趣而豁达的性格，用一种犒劳自己，又可以招揽顾客的方式示人。

还有人在卖气球，五颜六色的气球在春风中飘摆，逍遥自在。一阵风吹来，它们似乎想要挣脱那细细的、结实的绳索，随着春风飞向远方。卖气球的人，大概骨子里喜欢飞翔吧，一个气球在空中飞，他们的心儿也随之飘远。



■ 拓墨山水 孙其光

与夫青老师二三事

1月19日早，阴。空气郁结，冷风阵阵，往日小区门前苍翠的松柏似也失掉了神气，蔫蔫地杵在那儿，孤独，清冷。出行依然不畅，心里憋闷异常，倒不是因为横行霸道的斗气车，也不是鬼哭狼嚎的催命汽笛，而是因为此行的目的——送别我们敬爱的夫青老师。

上午9时，偌大的青岛市殡仪馆追瞻厅内，站满了前来送别夫青老师的亲朋好友。哀痛遍布每个角落，萦绕在所有人心头。胸戴白花，手捧黄菊，再看一眼我们的前辈、同事、朋友——赵夫青，向他深深地三鞠躬，心中祝愿他在天国无忧。这是夫青老师退休后，我与他第二次谋面，上次在一个文学活动上，他见我来了，乐呵呵地招呼我。我赶紧走上前，拉住他的手。夫青老师有双大手，手指很粗，握上去很厚重，可是他并不用力，只是轻轻握着，很注意风度，一如他的为人。他当时问了我一些单位上的事，又问我最近的创作，还嘱咐我好好写，只有做到心无旁骛，才能出好作品。对此，我谨记在心。谁曾想到，笑貌在心，音犹在耳，再见却已成永别。缅怀送别了夫青老师，我和张彤站在门口，彼此无言，各自收拾着脸上的泪水，又见许东国从门内走出，眼眶湿润，不住地唉声叹气。上周，他刚来送别了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，李建国老师。不远处的台阶上，刘涛、李明、李洁等几位老师围站在一起，抽烟的抽烟，慨叹的慨叹，心情都很沉重。

离开殡仪馆，走在回单位的路上，车上的广播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——姜育恒的《再回首》。从他沙哑的嗓音中，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总是匆匆忙忙的赵老师，那个穿着质朴、笑容温暖的赵老师，那个学识渊博、著述等身的赵老师，那个刚正不阿、正直果敢的赵老师。

2014年，我考进《青岛文学》杂志社，也就是如今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的前身，与夫青老师成为同事。第一次见夫青老师是在周例会上，他个子不高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眉毛浓密，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穿着松垮的上衣和一条洗褪色的牛仔裤。从外表上看，很难将他与岛城著名的学者、编辑的名头联系在一起。在例会上，赵老师鲜少发言，但只要开口，必定是雷霆万钧之势。他的嗓子哑哑的，声音却出奇的大，每个字都斩钉截铁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同事们都正襟危坐，仔细聆听，不敢乱插话，大家对他的学识和判断都十分推崇，自然只有认真听讲的份儿。

赵老师平时来单位的频率很高，大多是来整理文稿。因为不太精通电脑，所以经常寻我们小年轻帮忙，找我的次数最多。每次遇到电脑操作上的难题了，他就噤噤噤噤走到我们屋外，轻敲几下门，再问：“国梁在吗？”我便赶紧起身，迎他进来。每次解决了难题，赵老师都哈哈大笑几声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你可真是‘专家’啊。”临了一定得反复说几遍“谢

谢”。初识夫青老师，便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，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，对待我们初涉编辑行业的新人如此平和亲切，令我们备受感动。

接触时间长了才渐渐了解，夫青老师是山师大的高材生，对美学等文艺理论都有深入的研究。主编过《青岛市地名志》《青岛事典》《青岛百科全书》等多部大部头的作品。在刊物编辑方面，夫青老师一丝不苟，多年来，从未出现过编校方面的问题，他所负责的“文事”栏目，经常刊发重要文学人物的访谈笔录，对岛城文脉的梳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外人眼中，夫青老师是一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，同样，他对自己在刊物编辑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要求也十分高。记得有一次，他在办公室影印一份古籍的内页，因为年久，加之保存不善，缺损严重，古籍上的字迹难以辨别。他便找我们几个眼神好的小年轻帮忙辨认。我们围着这张纸，围绕上下文，猜了半天也没猜出那个是什么字。后来又过了几个月，在一次宴会上遇到赵老师，他见到我之后说：“国梁，你还记得上次我让你们帮忙辨认那个字吗？”我嘴上说着“哦哦”，其实脑子在飞快搜寻记忆，对于辨认字迹的事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他兴奋地说：“我从外地同学那里查到了答案，在上海图书馆里，有那本书的原本，幸好，那一页是完整的。那个字是‘遽’，你说说，谁能想到？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